

唐曹怡墓相关问题研究

王 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4.11.007

2007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汾阳市博物馆抢救性发掘了唐代曹怡墓,墓中出土的青瓷器十分特殊,墓志记载的内容也很重要,对文献记载有补正和补充作用。下面就曹怡墓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and 探讨,墓志录文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山西汾阳唐曹怡墓发掘简报》^[1]。

一 隋末唐初汾阳曾属介州

据《汾阳县志》载:汾阳在“秦统一全国后,仍名兹氏县,隶太原郡。

汉属并州刺史部——太原郡。新朝易名兹同。东汉复为兹氏县,仍属并州刺史部之太原郡。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年),置并州西河郡,郡治设于兹氏县,县属之。西晋咸宁三年(277年),改封陈王司马斌为西河王驻兹,改郡为国,兹氏易名隰县隶之。永安元年(304年),地归前赵(刘渊)。以后邑先后递归后赵、前秦、前燕、后燕,拓跋珪皇始元年(396年)地归北魏。太延(435~440年)中隰城县改称什星军。太和八年(484年)复名隰城县,邑置西河郡,隶于汾州,州治设于蒲子城(今交口县蒲依村)。孝昌二年(526年)山胡起义军围蒲子,汾州移至隰城。

东魏、北齐,隰城县均隶属于汾州西河郡,州、郡治均置于隰城县城。北周于建德五年(576年)取汾州,废州,西河郡隰城县改隶于介州。

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郡,隰城县直属介州。大业三年(607年)州改郡,复西河郡,郡治置隰城。

唐武德元年(618年),西河郡改称浩州,属河东道。武德三年(620年)复称汾州,治隰城县如故。天宝元年(742年)改汾州为西河郡。乾元元年(758年)复名汾州。州郡治所均设于隰城县城。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县名改称西河县。历五代、宋、金、元,县名均称西河,属于汾州,汾州治所在县城。其间,周显德元年(954年)宁化军置于县。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汾州西河郡军置于县,宣和年间(1119~1125年)汾阳军置于县。”^[2]

曹怡墓出土墓志中记载的“永徽六年”为唐高宗李治的年号,即655年。曹怡在追述自己父亲的生平履历时提到“父遵,皇朝介州萨宝府车骑都尉”。《新唐书》载“义宁元年(617年)^[3]以介休、平遥置介休郡,武德元年(618年)曰介州,贞观元年(627年)州废”^[4]。另《元和郡县志》载:介州“贞观元年州废,以县属汾

州。”^[5]由此可见,隋末唐初曾设介州,汾阳属介州所辖。

二 “萨宝”与“萨宝府”的设置

对于萨宝及萨宝府是学术界近年来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随着虞弘墓、安伽墓等墓葬被发现,粟特人以及管理少数民族问题的萨宝府又开始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以往在太原附近这类遗存发现较少,而文献中的记载却较为常见,寻找这类遗存显得迫在眉睫。

汾阳曹怡墓的发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在曹怡墓志被确定之初,张庆捷就对墓志的内容做过初步研究^[6],限于当时的情况,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等相关信息没有及时公布。2010年8月,王仲璋的《汾阳出土唐代墓志选编》中收录了曹怡墓志、释文及注解^[7]。2012年3月,在征得王仲璋同意后,我们重新对曹怡墓的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发现了珍贵的陶俑及青瓷器等随葬品,它对研究曹怡及其家族至关重要。

“萨宝”一职,北朝、隋已设,见于《隋书》卷二七《百官志》。据《通典》卷四〇《职官典》,唐朝还设有管理火祆教的祀官——萨宝的府官,主持祭祀。萨宝府官分为萨宝、祆正、率府、府史等,自四品至七品不等,由波斯人或西域人担任。“萨宝”在中国史籍中也称为萨甫、萨保,其作用是掌管胡人聚居地区的宗教及行政^[8]。

随着考古资料的逐渐丰富,对“萨宝府”的认知也愈加清晰。譬如,曹怡的父亲曹遵便是萨宝府的车骑都尉。张庆捷已指出:“萨宝府下设‘车骑都尉’等军职,负责与军事有关的事务。”并且,“由曹怡祖父、父亲和他的经历来看,颇耐人寻味。其父官制与祖父不同,不存在继承世袭关系”^[9]。以上的认识证明,隋唐时期的并、代、介三州确实存在过萨宝府,不但管理胡人聚居地区的宗教及行政,还可能兼具部分军事职能。

三 “骑都尉”、“车骑都尉”与“壮武将军”

“骑都尉”这一官职最早见于西汉高祖元

年(前206年),《汉书·靳歙传》中以建武侯靳歙为“骑都尉”^[10]。西汉武帝以后,都尉有三种情形:一为皇帝的近侍官员,如奉车、骑马、骑都尉等;一为职事官员,如中央政府的水衡、搜粟、治粟等;一为郡国官员,如郡都尉、属国都尉。汉代以后,历代各有不同。有一种是赏给功臣的荣衔,如唐宋两代勋官中的轻车都尉、骑都尉等。曹怡所任的“骑都尉”,很可能就是一种勋官。无独有偶,在太原小井峪村发现的龙润之子《龙义墓志》(657年)中就明确记载其被授予“骑都尉”一职^[11];而龙义之父龙润曾经担任过“萨宝府长史”,对龙润家族被确定为西域粟特胡人无疑是最好的证据^[12]。龙义担任的骑都尉,是武德七年位阶中的从五品勋官,应该是由同品级大业散官转换过来的^[13]。

萨宝府下设的“车骑都尉”一职,目前不见于文献资料,笔者推测可能是萨宝府中的职事官。

“壮武将军”为武散官名,梁置杂号将军,唐列入武散官,北宋前期为武散官二十九阶中的第七阶,正四品下^[14]。曹怡墓志记载其祖父曹贵为“齐壮武将军”,说明这一官职在北齐时期已经出现,这对以往文献是一个补充。但从北宋时期壮武将军的品秩看,曹贵的职位较高,应在正四品之上。

四 隋末唐初昭武九姓中的“曹国”及“曹国人”

8世纪时,新罗人慧超著有《往五天竺国传》,内称:“安国、曹国、石国、石螺国、米国、康国……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15]《隋书·西域记》载:“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16]《新唐书·康国传》称曹国“大城三十,小堡三百”^[17]。史书中记载的魏晋至隋唐时期曹国人比较出名者多为善弹琵琶的好手,如曹僧奴、曹妙达、曹保保、曹善才、曹纲等^[18]。当时

诗人刘禹锡听完曹纲演奏的《薄媚》大曲后，发出了“人生不合出京城”的感叹；而诗人白居易则写下“谁能截得曹纲手，插向重莲衣袖中”。

据粗略统计，现今发现的唐代曹姓人可确定为西域曹国人的，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女性，如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唐开元十一年曹明照墓志^[19]；第二类，著有军功的，如唐曹恽墓志^[20]、隋曹谅及妻安氏墓志^[21]、唐曹钦墓志^[22]等，晚唐时期还有曹景林墓志、曹慧琳墓志^[23]；第三类，曹姓胡裔，如曹炎延、曹禄山、曹果毅、曹毕娑等^[24]；第四类，曹姓“作人”，如曹野那、曹伏磨、曹延那等^[25]。“作人”就是雇工，从出土的麹氏高昌王国时期到唐代西州时期的相关吐鲁番文书表明，他们是为异姓胡人服务的，身份较低。

颇有军功的曹恽历任隋车骑将军、豫章都尉、臻州道行军总管；曹谅历任泾州涇城府鹰扬，其父为齐定州刺史；曹钦曾拜“正议大夫”，随李世民四处征战，功勋卓著。他们主要为武

职，且为“元从”，也就是并州起兵的元老，与曹怡及祖辈颇为相似。至于曹景林兄弟时代已进入晚唐，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

五 青釉龙柄鸡首壶和青釉梅瓶的年代

曹怡墓中出土的两件青釉瓷器值得关注，其中龙柄鸡首壶在以往山西考古发掘中多有出土，不但级别均较高，且多为北齐时期。如1973年发掘的山西祁县白圭镇北齐天统三年（567年）韩裔墓^[26]（图一）、1981年发掘的山西省太原市王郭村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娄睿墓^[27]（图二）、2003年发掘的山西省太原市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徐显秀墓（图三）^[28]等均有青釉龙柄鸡首壶出土。另外如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北塬北魏永熙三年（534年）韦乾墓（图四）^[29]、西安市纺织医院工地墓葬（图五）^[30]、河北省河间县沙窝村墓葬（图六）^[31]也出土此类器。仔细比较出土的这几件器物，均与曹怡墓中所出器物有较明显的区别。曹怡墓所出青釉龙柄鸡首壶是目前已知与北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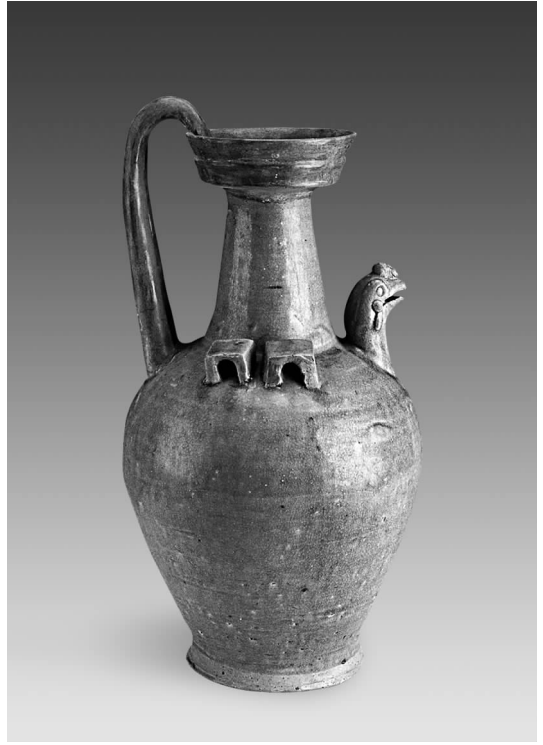
图一 山西祁县韩裔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图二 山西太原娄睿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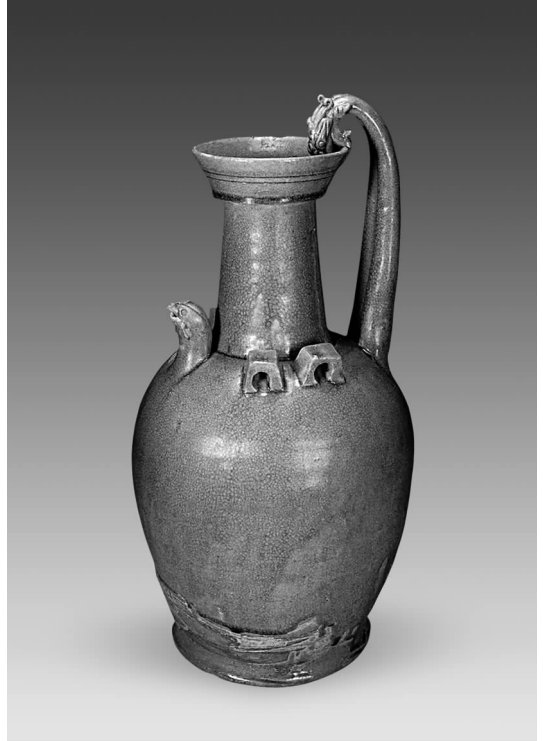
图三 山西太原徐显秀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图四 陕西西安韦乾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图五 陕西西安纺织医院工地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图六 河北河间沙窝村墓出土青釉龙柄鸡首壶

青釉龙柄鸡首壶在器形上最为接近的器物,所以,我们不能排除这件器物的生产年代可以到北齐或隋。

曹怡墓所出青釉梅瓶的时代更为特殊,因为墓葬的时代为唐永徽六年(655年),此年代应为梅瓶烧造年代的下限。然而,从现有的资料看,梅瓶的时代多为唐末至北宋^[32]。唯一可以与曹怡墓出土梅瓶进行比较研究的是陕西西安市北郊出土的白釉梅瓶(图七)^[33]。曹怡墓中梅瓶的发现让我们领略到唐早期梅瓶的风采,也为梅瓶器形演变过程中补充了关键的一环。

六 曹怡墓志中几个特殊字、词的释读

曹怡墓志的志文在《汾阳市博物馆馆藏墓志选编》中已对近二十个字、词进行了释读,除了上文中已论述过的“壮武将军”、“都骑都尉”、“骑都尉”、“萨宝府”之外,还有几个字词没有解读清楚。为此,我们重新加以注释,以作补充。

1. 文王之昭

据《左传》定公四年记祝佗说:“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管、蔡、郇、霍、鲁、卫、毛、聃、郟、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34]曹怡为了更好地融入唐人社会,便将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西周曹国姬姓周人当作自己的先世,这一点与当时的社会风气颇为吻合。

2. “景辰”应作“丙辰”

这样的称呼多见于隋代,如“史书一年两号”条。史家变乱年号,始自《隋书》:“大业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而下即书云:‘二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等作乱,上崩于温室。’按此大业十三年,炀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长安之号,甚为无理。(杨氏曰)史家已云尊帝为太上皇矣,岂有以太上皇而纪年号者乎?近者言之不顺,故必冠以义宁也。作史者唐臣,不得不尔。然于《炀帝纪》书十三年,于《恭帝纪》书二年,两从其实,似



图七 陕西西安北郊出土白釉梅瓶

亦未害^[35]。《新唐书》卷一《本纪第一》载:“(大业十二年)十一月丙辰,克京城。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图籍。约法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者死。癸亥,遥尊隋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皇帝。大赦,改元义宁。”^[36]两条史料均出自正史,对“克京师”的时间记录比较一致,这里的“景辰”应该就是“丙辰”的一音之转。同样的史料在《隋书》卷一《纪志第一》:“(义宁)二年,右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鹰扬郎将孟景……以骁果作乱入犯宫闱。上(炀帝)崩于温室,时年五十。”校勘记:“(二)孟景‘景’应作‘秉’。唐人讳‘昞’,因‘秉’、‘昞’同音,遂改‘秉’为‘景’^[37]。‘景辰’为‘丙辰’当无误。

然而,查《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38]发现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十一月只有“癸亥”,没有“丙辰”、“辛酉”等历日。看来《正史》的历日记录存在偏差。不过,这对“景辰”一词的释读没有影响。

-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汾阳唐曹怡墓发掘简报》,《文物》本期。
- [2] (清)周超等《汾阳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 [3] 李崇志《中国历代年号考》,第93页,中华书局,2001年。义宁,隋恭帝杨侑年号(617~618年)。按,《旧唐书·高祖记》:大业十三年十一月“癸亥,率百僚,备法驾,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大赦,改元为义宁。”
- [4]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第1004页,中华书局,1975年。
- [5]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
- [6] 张庆捷《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序》,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0年。
- [7] 王仲璋《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选编》,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0年。
- [8] 施安昌《火坛与祭司神鸟》,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 [9] 同[6]。
- [10] 《汉书·职官志》,中华书局,1962年。
- [11]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293页,三秦出版社,1999年。
- [12]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5辑,第216页,三秦出版社,1998年。
- [13] 毕波《中古中国的粟特胡人——以长安为中心》,第102~10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 [14] (唐)李林甫《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
- [15] (唐)慧超,张毅笺注《往五天竺国传笺释行记笺注》,中华书局,2000年。
- [16] 《隋书》卷八三《西域列传》,第1855页,中华书局,1973年。
- [17]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列传》,第6243页,中华书局,1975年。
- [18] 龚方震、晏可佳《袄教史》,第22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本),第348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另外,第336页记录有发明了减字谱记谱法的曹柔和赠予白居易琵琶谱的曹供奉等,虽然不能确指为西域曹国人,但就他们姓曹,并且也从事与西域乐器相关的工作这一点来说,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 [19] 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第14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 [20]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369~370页,三秦出版社,2005年。
- [21] 韩理洲《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4年。
- [22]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405页,三秦出版社,1996年。
- [23]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212~213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
- [24]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242~24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第470~479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 [25] 同[13],第279~280页。
- [26] 陶正刚《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文物》1975年第4期;石金鸣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5·山西》,第11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青釉龙柄鸡首瓶,北齐(550~577年),口径9.8、底径10.6、高37.5厘米,1973年山西祁县白圭镇北齐天统三年(567年)韩裔墓出土,现藏山西博物院。
- [2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彩版一四〇,文物出版社,2006年。青釉龙柄鸡首壶,北齐(550~577年),口径11、底径13、高50.5厘米,1981年山西省太原市王郭村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娄睿墓出土,现藏山西博物院。
- [28]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徐显秀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石金鸣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5·山西》,第1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青釉龙柄鸡首壶,北齐(550~577年),口径12、底径12.7、高49.6厘米,2003年山西省太原市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徐显秀墓出土,现藏山西博物院。
- [29]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南郊北魏北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5期。青釉四系鸡首壶,北魏(386~534年),口径12、底径13.5、高43.2厘米,陕西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北塬北魏永熙三年(534年)韦乾墓出土,现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 [30] 刘云辉、周奎英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5·陕西》,第10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白釉双龙柄瓶,唐代(618~907年),口径6、底径8、高31.6厘米,陕西西安市纺织医院工地墓葬出土,现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河北邢窑或河南巩义窑烧造。
- [3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珍瓷赏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瓷选介》,科学出版社,2007年。青釉龙柄鸡首壶,盘口,长颈,溜肩,深腹,平底。双龙形柄,鸡首形流,肩部安对称桥形系,胎质粗松,胎色青灰,釉色青中闪黄,有细碎开片,口径12.5、高50.5厘米,1974年河间县沙窝村墓葬出土。
- [32] 廖宝秀《梅瓶略史——梅瓶的器用及其器型的演变》,《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一卷第二期,1993年。

(下转第73页)

综上所述,响堂山天宫殿建筑年代下限为唐代早期,有建于东魏、北齐的可能。从门柱上残存的四处题记及门槛上的莲纹装饰图案来看,天宫殿早期应为佛教道场,到唐代早期曾一度为道士所用,并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投龙璧活动。响堂山也不仅是一座佛教名山,佛、道二教的势力应在响堂山有一个此消彼长或互容共生的过程。

- [1] 张林堂、许培兰《响堂山石窟碑刻题记总录》第2册,第159页,外文出版社,2007年。
- [2] 此行笔迹与题记其他文字不同,应与东侧门柱题记不是一体。
- [3] 同[1],第101页。
- [4] 《旧唐书》卷一五四《孔巢父传附从子戢传》,第4099页,中华书局,1975年。
- [5] 《全唐文》卷四八八《昭义军事宜状》,第2953页,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 [6] 《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第4003页,中华书局,1975年。
- [7] 《旧唐书》卷一三五《卢元辅传》,第3718页,中华书局,1975年;《新唐书》卷一九一《卢元辅传》,第5526页,中华书局,1975年。
- [8] 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2册,第995页,杭州出版社,2004年。
- [9] 同[1],第158页。
- [10] 何士骥、刘厚滋《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6册,第474页,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 [11] 《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第707页,中华书局,1965年。
- [12]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第516页,中华书局,1983年。
- [13] 同[12]。
- [14] 《隋书》卷三〇《地理中》,第858页,中华书局,1973年。
- [15]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二》,第1512页,中华书局,1975年。
- [16] 蒋振华《古代最早描写道教“投龙筒”的文人诗》,《世界宗教文化》2004年第4期。
- [17] 陈垣《道家金石略》,第100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 [18] 雷闻《唐长安太清观与〈一切道经音义〉的编纂》,《唐研究》第十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 [19] 同[1],第114页。
- [20] 同[1],第226页。
- [21] 同[1],第215页。
- [22] 同[1],第220页。
- [23] 同[1],第192页。
- [24] 《资治通鉴》第11册,第4957页,中华书局,1956年。
- [25] 《永乐大典》第6册,第5926页,中华书局,1986年。
- [26]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三三《齐邺下大庄严寺释圆通传》,第917页,(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本,2012年。

(责任编辑:戴茜)

(上接第65页)

- [33] 刘云辉、周奎英主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15·陕西》,第66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白釉梅瓶,唐代(618~907年),口径7、底径15.5、高33厘米,陕西西安市北郊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北邢窑烧造。
- [3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
- [35]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秦克成点校《日知录集释》卷二〇,第716页,岳麓书社,

1994年。

- [36] 《新唐书》卷一《本纪第一》,第9页,中华书局,1975年。
- [37] 《隋书》卷一《纪志第一》,第98页,中华书局,1973年。
- [38] 方诗铭、方小芬《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第3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李媛媛 杨冠华)